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发展理论研究

——第二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研讨会综述

李忠民 王文军^{*}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来探讨发展问题,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8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在西安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高校、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围绕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

一、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构建

与会专家首先讨论了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关注的焦点、研究的方向,并结合中国转型经济探讨如何建设发展经济学等重大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仍然是建立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上,且要处理好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发展的关系,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和国际贸易、上层建筑改革等问题。同时,当前还应进一步关注农业生产问题,尤其是农业工业化、土地流转及土地所有制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入的研究。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展望角度,研究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是处于转型中的、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情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西方发展经济学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并且自身存在不足,如缺乏完整体系、部分理论过时等,所以我们应该注重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尤其是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创新,以进一步扩展研究空间,推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武汉大学叶初升教授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强。这一基本问题既没有在实践上过时,更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圆满的解答。然而,直到今天,关于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地位,经济学界仍然充满争议甚至诘难。叶初升教授认为,这些争辩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其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是否需要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二,发展经济学以怎样的理论范式去满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或者说发展经济学能否以独特的理论范式分析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对这些问题,叶初升教授做出评论: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只是为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但发展经济学还缺乏自身独有的“理论之根”;其次,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能否独立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拥有特殊的理论范式;最后,发展经济学独特的学科范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微观基础

^{*} 李忠民,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邮政编码:710062,电子信箱:lizhongmin1966@yahoo.com.cn;王文军,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邮政编码:710062,电子信箱:wwjunxida@163.com。

之上。遗憾的是,目前发展经济学还缺乏微观基础,所以尚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学者们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应当结合当前中国的转型经济特征,以全面发展和推进。如香港中文大学杜巨澜副教授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正确认识上,中国的最优模式是管制模式,这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选择该模式要注意合理秩序、产权保护、避免企业重组不良资产及政府干预存在的寻租等问题。江西财经大学张进铭教授就我国转型时期的财政支出与政府职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利用财政收入、支出以及发行国债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政府的职能不应该是直接干预市场,而应当在市场失败时,减轻贫困和改善收入,维护人们获得一些便利的权利。政府应当在短期之内改变目标,不再盲目追求 GDP 的增长,而是注重就业,进一步控制政府支出,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为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他认为,中国转型的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指的是政府对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没有任何分别)。姚洋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产生中性政府的基本原因。

华中科技大学汪小勤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特色”的理解。她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趋同”效应。我们应当关注中西方两种制度的相互影响。山东大学张东辉教授认为“发展是全球永恒的主题”,只是因为不同国家存在着发展目标、内容的不同,且不同阶段应该解决的问题亦存在着差异性。所以,中国发展经济学应该结合中国发展的目标而进行学科建设,这样才会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王琴梅副教授指出,中国最大的特色集中体现在现阶段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即农业向工业转型、外向出口向扩大内需的转型。只有解决好这两个转型问题,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目标才可谓成功。

与会专家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问题,以全面推进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进步。武汉理工大学周军教授以企业的本质、企业存在的原因、企业的作用以及企业发展的道路类型、限制因素和动力系统等方面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发展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体系的思路。他从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出发,分析了市场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的差异。在分析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市场和企业在本质和特征上的差异,继而明确了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不发达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和市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不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像是个体生产单位的替代物。他认为,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总体上偏向宏观经济领域,应加强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青岛大学雷定安教授认为,当今国内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因而大大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他将此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五点:一是国外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派的影响;二是对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产生误解;三是发展经济学本身也是在探索和完善中;四是我国经济学界缺乏对发展经济学有组织的系统研究;五是未能及时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对此,他强调应当注重以下工作:对现代发展经济理论进行新综合、新提升和新发展;提出新的经济发展伦理;加强财产权及其保护制度的研究;加强对全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正确处理发展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

武汉大学王今朝副教授认为不存在单一经济学,经济学仍需发展。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仅代表中产阶级思想,我们应当运用政治经济学阶级分析的方法做更全面的分析,要摆脱对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过度崇拜,只有这样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够有所突破。为此,他还提出了十个有待探讨的问题:(1)中国走的是不是比较优势道路?(2)新古典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不具有实践指导性;(3)计划经济并不一定是计委调配资源;(4)美国经济的剥削本性;(5)中国控制住二级市场,但不要控制一级市场;(6)中国怎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7)通过允许农村资产特别是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来增加消费,最终将导致无法扩大内需;(8)国有企业改革;(9)以人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而是以集体和社会为本;(10)要不要设定发展目标?

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从培养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才角度出发,对该学科的理论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人民大学彭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教学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较好,但教

学状况并不好。他结合实例,分析了这一问题。比如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进行对比,可以看到该学院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丰富多彩,形成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学生选择范围大,且师资力量雄厚,名师云集,教授诲人不倦。该学院尤其强化发展主题,营造发展氛围,致力于培养发展经济学人才。这与国内很多高校发展经济学课程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受重视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强调应该借鉴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验,提高我国发展经济学的教学水平。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理论的构建应当从普遍性出发,继而再对适合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理论进行细化。如榆林学院张晓副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应当放弃“门户”之争,即所谓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发展经济学之争;同时,认为在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适用性掌握与理解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国的现实来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才有意义。

二、当前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及应对措施

与会专家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经济状况、发展出路、应对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强调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大,我们需要思考新的国际金融战略,需要具体考虑对外依存度多高合适、是否应持有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应该是什么等问题。他强调了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作用,提出减少由地方政府干预造成的地方金融危机,缔造信用文化,推广信用联保等观点。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分析了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影响。他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相比,有两大不同:第一,成因不同。大萧条是由于美国消费力不足,无法带动相关生产行业所导致的全国性经济疲软,而此次次贷危机是由于借贷过度导致消费过剩,以至次贷市场陷入危机,整体经济陷入困境;第二,两次危机中政府角色不同。大萧条时,美国政府对经济调控尚未积极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次的次贷危机是由于国家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导致规模扩张,以至于控制力下降,进而导致危机发生。所以,美国以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政策需要加以调整,金融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中国利用行政监管金融体系的方法值得借鉴。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影响范围更广,但多年来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国内金融体制已经相对健全,此次危机对我国整体经济影响较小。亚洲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全面下降,金融紧缩现象凸显。而美国次贷危机目前仅造成我国贸易出口下降,对外资影响较小,国内消费降幅也较小,总体态势良好,应对能力较强。

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在于产业创新,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在当前危机下能够健康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贫困率大幅度降低,创造了人类发展千年减贫的增长奇迹。中国经济增长以实体经济增长为主,虚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一劣势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产生了隔离效应,较好地保护了我国经济。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形成“双核驱动”,即政府和民众共同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工业扩张、产业链的形成,加快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长。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由依靠内需战略,转向创新发展。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应当把握危机中的机遇和挑战,以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如咸阳师范学院丁文锋教授从2008年我国遭遇的冰雪和地震两大灾害入题,提出如何在减轻和减免灾害中谋求发展。丁文锋教授认为,可以利用多元演进、主体互动的发展机理,实现一般规律与特殊情况的结合,进一步探索发展道路。他认为未来经济学发展前景可观,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发展来解决,我国学者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为经济学发展做贡献。

此外,有些学者还对金融危机下的相关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和剖析。如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雷宏振教授对金融危机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从历史上的两次经济危机对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入手,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效益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能够适时地“走出去”,且方法得当,此次危机也会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机遇。他认为前两次危机的结果——美国的强大以及日韩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会的诸多代表就此问题发表了观点,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北大学的安树伟教授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及政策倾向。他指出,当前我国东部领先发展的格局未变、中部崛起的政策效应已经显现、西部大开发继续走向深入、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任重道远。但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区域利益关系尚未理顺,振兴东北地区的政策效应尚未体现出来,主体功能区推进尚处于规划阶段,重大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显著等。基于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二是适当控制东部地区的开发强度,提高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质量;三是提升中西部产业配套能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陕西师范大学李忠民教授对大关中经济区“能源增长极”构建与培育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大关中应突破原有关中区域的概念,即除关中经济区本体(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杨凌)之外,延伸至延安、榆林、东胜、太原、运城、临汾、兰州、庆阳、平凉、天水、固原、三门峡 12 个城市组成的范围。他进一步指出,要利用这一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增长极”,从而带动陆桥中国段经济的整体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吴超林教授则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为例进行了研究。吴教授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以及采用 Miller - Round 模型测算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得出东部地区内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较高,区域内乘数效应大;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较低,尤其是西部地区产业分布分散,区域内乘数效应小;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中西部地区溢出效应较低,而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溢出效应较高。这一结论,为我国区域差距的持续扩大提供了新解释。为此,吴教授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清除区际贸易壁垒,促进中西部内部各区域之间的产品交流和产业关联,提高区内乘数效应;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发展东部地区溢出效应大又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资源型产业,提高产品的工艺水平和品质,更好地适应东部地区的产品需求。

陕西师范大学王文军博士报告了对陕西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陕西作为全国能源资源丰富区之一,能源产业是陕西省工业发展的动力,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能源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较短、产业效益低下等。制约陕西能源产业发展的因素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能源资源开采技术落后和外部不经济。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优化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措施,以保证陕西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与会的一些专家还对其他一些发展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和新思路。如西北政法大学张军政副教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建立相应的转移组织。武汉大学张彬教授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探索,提出中国应当适时改进和调整贸易战略,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天津财经大学邹卫星副教授则对经济增长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对发展的程式化事实提供了量化思考。他认为,发展应当注重资本效用的权重,尤其是要科学地制定资本效用权重的比重,这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责任编辑:陈永清)